

罗振玉评传

罗琨 张永山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國學大師叢書


趙景深題



罗振玉评传

罗琨 张永山 /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 HUA ZHOU WEN YI CHU BAN SHE

國學大師叢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罗振玉评传 / 罗琨 张永山著. --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4.10
(国学大师丛书)
ISBN 978-7-5500-1114-4

I. ①罗… II. ①罗… III. ①罗振玉 (1866 ~ 1940) - 评传 IV. ①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36028号

罗振玉评传

罗 琨 张永山 著

出 版 人	姚雪雪
统 筹	毛军英
责任编辑	张 越 童子乐
书籍设计	方 方
制 作	何 丹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9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 × 1168mm 1/16 印张 13.25
版 次	1996年12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2版 2015年3月第2次印刷
字 数	19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1114-4
定 价	22.50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4-24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国学大师丛书》编辑委员会

《国学大师丛书》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永兴	石峻	任继愈	刘桂生	汤一介
阴法鲁	张岱年	季羨林	周一良	庞朴
赵朴初	姜义华	龚书铎	戴文葆	戴逸

组织编辑委员会成员:

桂晓风	熊向东	刘国藏	邓光东	周榕芳
朱焕添	王志斋	范卫平	关小群	钱宏
彭开天	傅伟中	李晁生	朱光甫	毛军英
尹飞舟	赵焜森	刘义林	董士伟	王守常
方鸣	钱文忠	傅修延	陈晋	宋志明
景海峰	赵丽雅	李晓岗	陈娟	黄卓越
陈骏涛	刘烜	魏漫伦	刘庆生	

丛书封面题签 赵朴初

丛书总体编辑 钱宏

丛书肖像木刻 颜仲

总序

张岱年

中华学术，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呈现了学术思想的高度繁荣。两汉时代，经学成为正统；魏晋之世，玄学称盛；隋唐时代，儒释道三教并尊；到宋代而理学兴起；迨及清世，朴学蔚为主流。各个时代的学术各有特色。综观周秦以来至于近代，可以说有三次思想活跃的时期。第一次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竞胜。第二次为北宋时代，张程关洛之学、荆公新学、苏氏蜀学，同时并兴，理论思维达到新的高度。第三次为近代时期，晚清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凌侵，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道，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

试观中国近代的学风，有一显著的倾向，即融会中西。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对于中国学人影响渐深。深识之士，莫不资西学以立论。初期或止于浅尝，渐进乃达于深解。同时这些学者又具有深厚的旧学根柢，有较高的鉴别能力，故能在传统学术的基础之上汲取西方的智慧，从而达到较高的成就。

试以梁任公（启超）、章太炎（炳麟）、王静安（国维）、陈寅恪四家为例，说明中国近代学术融会中西的学风。梁任公先生尝评论自己的学术云：“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



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根深蒂固，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狭，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清代学术概论》）所谓“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正表现了融合中西的倾向，不过梁氏对西学的了解不够深切而已。梁氏自称“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这未免过谦，事实上梁氏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启蒙思想家，诚如他自己所说“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梁氏虽未能提出自己的学说体系，但其影响是深巨的。他的许多学术史著作今日读之仍能受益。

章太炎先生在《葑汉微言》中自述思想迁变之迹说：“少时治经，谨守朴学……及囚系上海，三岁不覿，专修慈氏世亲之书……乃达大乘深趣……既出狱，东走日本，尽瘁光复之业，鞅掌余闲，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不孙顺。”这是讲他兼明华梵以及西哲之说。有清一代，汉宋之学争论不休，章氏加以评论云：“世故有疏通知远、好为玄谈者，亦有言理密察、实事求是者，及夫主静主敬、皆足澄心……苟外能利物，内以遣忧，亦各从其志尔！汉宋争执，焉用调人？喻以四民各勤其业，瑕衅何为而不息乎？”这是表示，章氏之学已超越了汉学和宋学了。太炎更自赞云：“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秦汉以来，依违于彼是之间，局促于一曲之内，盖未尝睹是也。乃若昔人所谓专志精微，反致陆沉；穷研训诂，遂成无用者，余虽无腆，固足以雪斯耻。”太炎自负甚高，梁任公引此曾加评论云：“其所自述，殆非溢美。”章氏博通华梵及西哲之书，可谓超越前哲，但在哲学上建树亦不甚高，晚年又回到朴学的道路上了。

王静安先生早年研习西方哲学美学，深造有得，用西方美学的观点考察中国文学，独辟蹊径，达到空前的成就。中年以后，专治经史，对于殷墟甲骨研究深细，发明了“二重证据法”，以出土文物与古代史传相互参证，达到了精确的论断，澄清了殷周史的许多问题。静安虽以遗老自居，但治学方法却完

全是近代的科学方法，因而取得卓越的学术成就，受到学术界的广泛称赞。

陈寅恪先生博通多国的语言文字，以外文资料与中土旧籍相参证，多所创获。陈氏对于思想史更有深切的睿见，他在对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中论儒佛思想云：“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在吾国思想史上……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实在是精辟之论，发人深思。陈氏自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但是他的学术成就确实达到了时代的高度。

此外，如胡适之在文化问题上倾向于“全盘西化论”，而在整理国故方面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冯友兰先生既对于中国哲学史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又于40年代所著《贞元六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融会中西的哲学体系，晚年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表现了热爱真理的哲人风度。

胡适之欣赏龚定庵的诗句：“但开风气不为师。”熊十力先生则以师道自居。熊氏戛戛独造，自成一家之言，赞扬辩证法，但不肯接受唯物论。冯友兰早年拟接续程朱之说，晚岁归依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这些大师都表现了各自的特点。这正是学术繁荣，思想活跃的表现。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有鉴于中国近现代国学大师辈出，群星灿烂，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第三次思想活跃的时代，决定编印《国学大师丛书》，以表现近代中西文明冲撞交融的繁盛景况，以表现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的丰富内容，试图评述近现代著名学者的生平及其学术贡献，凡在文史哲任一领域开风气之先者皆可入选。规模宏大，意义深远。编辑部同志建议我写一篇总序，于是略述中国近现代学术的特点，供读者参考。

1992年元月，序于北京大学

重写近代诸子春秋

《国学大师丛书》在各方面的关怀和支持下，就要陆续与海内外读者见面了。

当丛书组编伊始（1990年冬）便有不少朋友一再询问：为什么要组编这套丛书？该丛书的学术意义何在？按过去理解，“国学”是一个很窄的概念，你们对它有何新解？“国学大师”又如何划分？……作为组织编辑者，这些问题无疑是必须回答的。当然，回答可以是不完备的，但应该是明确的。现谨在此聊备一说，以就其事，兼谢诸友。

一、一种阐述：诸子百家三代说

中华学术，博大精深；中华学子，向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精神著称于世。在源远流长的中国学术文化史上，出现过三个广开风气、大师群起的“诸子百家时代”。

第一个诸子百家时代，出现在先秦时期。那时，中华本土文化历经两千余年的演进，已渐趋成熟，老庄、孔孟、杨墨、孙韩……卓然颖出，共同为中华学术奠定了长足发展的基脉。此后的千余年间，汉儒乖僻、佛入中土、道教孳生，中华学术于发展中渐显杂陈。宋明时期，程朱、陆王……排汉儒之乖、融佛道之粹、倡先秦之脉、兴义理心性之学，于是，诸子百家时代再现。降及近代，西学东渐，中华学术周遭冲击，文

化基脉遇空前挑战。然于险象环生之际，又一批中华学子，本其良知、素养，关注文化、世运，而攘臂前行，以其生命践信。正所谓“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康有为、章太炎、严复、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鲁迅、黄侃、陈寅恪、钱穆、冯友兰……他们振民族之睿智，汲异域之精华，在文、史、哲领域筚路蓝缕，于会通和合中广立范式，重开新风而成绩斐然。第三个诸子百家时代遂傲然世出！

《国学大师丛书》组编者基于此，意在整体地重现“第三个诸子百家时代”之盛况，为“第三代”中华学子作人传、立学案。丛书所选对象，皆为海内外公认的学术大师，他们对经、史、子、集博学宏通，但治学之法已有创新；他们的西学造诣令人仰止，但立术之本在中华从而广开现代风气之先。他们各具鲜明的学术个性、独具魅力的人品文章，皆为不同学科的宗师（既为“经”师，又为人师），但无疑地，他们的思想认识和学术理论又具有其时代的共性。以往有过一些对他们进行个案或专题研究的书籍面世，但从没有对他们及其业绩进行过集中的、整体的研究和整理，尤其未把他们作为一代学术宗师的群体（作为一个“大师群”）进行研究和整理。这批学术大师多已作古，其学术时代也成过去，但他们的成就惠及当今而远未过时。甚至，他们的一些学术思想，我们至今仍未达其深度，某些理论我们竟会觉得陌生。正如第一代、第二代“诸子百家”一样，他们已是中华学术文化传统的一部分，研究他们，也就是研究中国文化本身。

对于“第三代诸子百家”及其学术成就的研究整理，我们恐怕还不能说已经充分展开。《国学大师丛书》的组织编辑，是一种尝试。

二、一种观念：一代人有一代之学术

纵观历史，悉察中外，大凡学术的进步不能离开本土文化基脉。但每一代后起学子所面临的问题殊异，他们势必要或假古人以立言、或赋新思于旧事，以便建构出无愧于自己时代的学术。这正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精神在每一代学子身上的最好体现。以上“三代”百家诸子，莫不如是。《国学大师丛书》所沿用之“国学”概念，亦当“赋新思于旧事”而涵注现时代之新义。



罗振玉
评传

明末清初，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颜（元）四杰继起，矫道统，斥宋儒，首倡“回到汉代”，以表其“实学实行实用之天下”的朴实学风，有清一代，学界遂始认“汉学”为地道之国学。以今言之，此仅限“国学”于方法论，即将“国学”一词限于文字释义（以训诂、考据释古文献之义）之范畴。

《国学大师丛书》的组编者以为，所谓国学就其内容而言，系指近代中学与西学接触后之中国学术，此其一；其次，既是中国学术便只限于中国学子所为；再次，既是中国学子所为之中国学术，其方式方法就不仅仅限于文字（考据）释义，义理（哲学）释义便也是题中应有之义。综合起来，今之所谓国学，起码应拓宽为：近代中国学子用考据和义理之法研究中国古代文献之学术。这些文献，按清代《四库全书总目》的划分，为经、史、子、集四部。经部为经学（即“六经”，实只五经）及文字训诂学；史部为史志及地理志；子部为诸子及兵、医、农、历算、技艺、小说以及佛、道典籍；集部为诗、文。由此视之，所谓“国学家”当是通才。而经史子集会通和合、造诣精深者，则可称为大师，即“国学大师”。

但是，以上所述仍嫌遗漏太多，而且与近现代学术文化史实不相吻合。国学，既是“与西学接触后的中国学术”，那么，这国学在内涵上就不可能，也不必限于纯之又纯的中国本土文化范围。尤其在学术思想、学术理论的建构方式上，第三代百家诸子中那些学贯中西的大师们，事实上都借用了西学，特别是逻辑分析和推理，以及与考据学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实证方法，还有实验方法、历史方法，乃至考古手段……而这些学术巨子和合中西之目的，又多半是“赋新思于旧事”，旨在建构新的学术思想体系，创立新的学术范式。正是他们，完成了中国学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我们今天使用语言的方式、思考问题的方式……乃得之于斯！如果在我们的“国学观念”中，将他们及其学术业绩排除在外，那将是不可理喻的。

至此，《国学大师丛书》之“国学”概念，实指：近代以降中国学术的总称。“国学大师”乃“近现代中国有学问的大宗师”之意。因之，以训诂考据为特征的“汉学”，固为国学，以探究义理心性为特征的“宋学”及兼擅汉宋者，

亦为国学(前者如康有为、章太炎、刘师培、黄侃,后者如陈寅恪、马一浮、柳诒徵);而以中学(包括经史子集)为依傍、以西学为镜鉴,旨在会通和合建构新的学术思想体系者(如梁启超、王国维、胡适、熊十力、冯友兰、钱穆等),当为更具时代特色之国学。我们生活在90年代,当取“一代人有一代之学术”(国学)的观念。

《国学大师丛书》由是得之,故其“作人传、立学案”之对象的选择标准便相对宽泛。凡所学宏通中西而立术之本在我中华,并在文、史、哲任一领域开现代风气之先以及首创新型范式者皆在入选之列。所幸,此举已得到越来越多的当今学界老前辈的同情和支持。

三、一个命题:历史不会跨过我们这一代

中西文明大潮的冲撞与交融,在今天仍是巨大的历史课题。如今,我们这一代学人业已开始自己的学术历程,经过80年代的改革开放和规模空前的学术文化积累(其表征为:各式样的丛书大量问世,以及纷至沓来名目繁多的学术热点的出现),应当说,我们这代学人无论就学术视野,抑或就学术环境而言,都是前辈学子所无法企及的。但平心而论,我们的学术功底尚远不足以承担时代所赋予的重任。我们仍往往陷于眼花缭乱的被动选择和迫不及待的学术功利之中难以自拔,而对自己真正的学术道路则缺乏明确的认识和了悟。我们至今尚未创建出无愧于时代的学术成就。基于此,《国学大师丛书》的组编者以为,我们有必要先“回到近现代”——回到首先亲历中西文化急剧冲撞而又作出了创造性反应的第三代百家诸子那里去!

经过一段时间的困惑与浮躁,我们也该着实潜下心来,去重新了解和领悟这一代宗师的学术生涯、为学风范和人生及心灵历程(大师们以其独特的理智灵感对自身际遇作出反应的阅历),全面评价和把握他们的学术成就及其传承脉络。唯其贯通近代诸子,我们这代学人方能于曙色熹微之中,认清中华学术的发展道路,了悟世界文化的大趋势,从而真正找到自己的学术位置。我们应当深信,历史是不会跨过我们这一代的,90年代的学人必定会有自己的学术建树。

我们将在温情与敬意中汲取，从和合与扬弃中把握，于沉潜与深思中奋起，去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这便是组织编辑《国学大师丛书》的出版宗旨。当我们这代学人站在前辈学术巨子们肩上的时候，便可望伸开双臂去拥抱那即将到来的中华学术新时代！

钱宏（执笔）

1991年春初稿

1992年春修定

008



罗振玉
评传

序 言

李学勤

21世纪,距离我们只有短短几年了。处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中国学术界,普遍感到有回顾过去、瞻望将来的必要,于是学术史的研究受到愈来愈多的注意。尤其是20世纪的学术史,看来已成为大家讨论的热点。从上一个世纪之交的清末开始,中国的学术进入了根本变革的时代。由旧学向新学过渡,中学的改造,西学的传播,逐步掀起二三十年代的巨大浪潮。中国现代学术的各个学科,大部分都是在这一时期拓建的,出现了许多作为学科奠基人的著名学者。其中影响重大,至今成果卓著的学科之一,是考古学。

谈到考古学,不少人认为中国古已有之。我们确实有着深厚的金石学传统,到北宋时已趋鼎盛,但这只是现代考古学建立的凭借。现代考古学有自己的理论和方法,应该视为一种新的学科,不能与传统的金石学同日而语。新的考古学的传入,在中国建立和发展,是有一段艰辛曲折过程的,而在这一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先驱人物,应首推罗振玉和王国维。

罗王之时,中国文物大量发现。1925年,王国维到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应学生会邀请作公开讲演,题为《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发现之学问》(《清华周刊》第350期,后收



罗振玉
评传

入《静安文集续编》)。他指出“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最大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而各地零星发见之金石、书籍，于学术有大关系者尚不与焉，故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见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随之他在清华的讲义《古史新证》中，进一步将这种观点发挥为著名的“二重证据法”。王国维所说的当时四大发现，无一不与罗振玉的学术活动密切相关。在这部评传里，大家可以看到罗振玉怎样建议刘鹗编成第一部甲骨著录《铁云藏龟》；怎样通过实地考察，弄清甲骨的出土地点，并考定其为商都遗址；怎样从法国学者沙畹处得到斯坦因汉晋木简的材料，与王国维合撰《流沙坠简》；又怎样索取伯希和手中敦煌卷子照片，编印《石室秘宝》等一系列专书。至于罗振玉收购内阁大库档案之事，更是世所周知的。由于当时历史的原因，王国维所说的“发见时代”实际是文物流散的时代，而整理著录这些文物的工作，竟为罗氏所负荷。

1929年，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写道：“罗振玉的功劳即在为我们提供出了无数的真实的史料。他的殷代甲骨的蒐集、保藏、流传、考释，实是中国近三十年来文化史上所应该大书特书的一项事件”，并对“他关于金石器物、古籍佚书之搜罗颁布，其内容之丰富，甄别之谨严，成绩之浩瀚，方法之崭新”也作了肯定。这无疑是公允的评价。

罗振玉1919年自日本归国，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曾请他讲授考古学，未能实现。那时，中国人还没有自己组织过科学发掘，现代的考古学尚未在中国确立，但罗振玉的一些研究已与传统的金石学有所不同。上面谈到的考察殷墟，便是显著的例子。他编著的古器物著录，不像许多金石书籍一样独重文字，如《古明器图录》等，别开风气之先。称他为中国考古学的先驱，绝非过当。

考古学在中国的奠立和发展，为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开辟了全新的途径。中国考古学多年具有的特点，就是与历史研究密切结合。这种特点，在其先驱人物如罗振玉、王国维的作品中，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读这部评传，可

以让我们看到中国考古学的这种特点是怎样从传统中得来的。借鉴先驱者的得失，也有助于我们认识今后前进的方向。

这部评传的作者张永山、罗琨伉俪多年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考古。罗琨副研究员是罗振玉的孙女，自幼从学于其父罗福颐先生。家学渊源，他们来撰写这部评传，自然是最恰当的人选。书中对罗氏生平作了详细如实的叙述，恰如其分的评点，把重点集中在其学术生活和成就方面。评传的出版，对学术史研究很有裨益，相信读者会欢迎这部好书。

1995年7月31日

于北京紫竹院

PRÉCIS

(英文提要)

A CRITICAL BIOGRAPHY OF
LUO ZHENYU (SUMMARY)

Luo Zhenyu, a noted epigrapher and archaeologist. His ancestral home is Shangyu of Zhejiang Province. But he was born at Huai'an, Jiangsu, in 1866 (on the twelfth date of the sixth month). He was dead at Lushun (Port Arthur) in 1940.

He had not left his native place—Huai'an until thirty years old. Devoting his life to study, he completed the Thirteen Classics in fifteen years of age, and then began to study the *Huangqing Jingjie* (Annotations to the classics by the Qing Scholars) in seventeen, laying a foundation for his further research work. By collating the notable book of *Jinshi Cuibian* (Collection of Inscriptions on Ancient Bronzes and Stone Tablets), in nineteen he finished his works *Dubei xiaojian* (Notes on Reading Tablets) and *Cunzhuo—zhai Zhaji* (Note of Cunzhuo Study), winning high opinion from Yuyue—the great master of the study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as he could expound and prove the classical and historical literature

by various inscriptions. While he was a private school master from twenty-five to thirty, he read hard many books of Confucian Classics, histories and explanations of their words, especially the *Ri Zhi Lu* (Notes on Knowledge Accumulated from Day to Day) of Gu Yanwu, and many other works of the military strategists and those of flood prevention work done on the Yellow River for the purpose of laying solid foundation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the meanwhile, he extended his studies of palaeography, textual criticism, family surnames, etc., completing some papers per year. Though his efforts were only complimentary and compiling, being confined within the limits of textual criticism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002



罗振玉
评传

In 1896, in coporation with his friend Jiang Bofu he went to Shanghai to run an agricultural journalism and its association, translating the European and Japanese modern agricultural papers and works, studying agriculture and publishing Agricultural Journal in order to spread the knowledge concerning agriculture. For more than ten years hereafter, he dedicated himself to agriculture and its teaching, going twice to Japan to make related investigation. Moreover, he published a magazine *Jiaoyu Shijie* (Educational World) with its related articles, regulations and information. He became editor of *Nongxue Congshu* (Series of Agriculture) and *Jiaoyu Congshu* (Series of Education), successively setting up or participating in setting up Dongfang Xueshe (Oriental Society), the Jiangsu Normal School, and being appointed as diretor of Hubei Agricultural School and of the department of the Jingshi Daxuetang (predecessor of the Peking University). Giving impetus to experimental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he was one of the founders of the Chinese modern agriculture. He gave advice to how to run the modern school system after abolishment of the imperial exams, proposing systematically concerned motions. He had many times made inspections on domestic education, offering some contributions to its modernization in its starting point.